

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数字化进程中的社会价值重构

牟多铎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马来西亚 柔佛州 士古来， 81310

摘要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理性逐渐成为塑造社会运行方式与治理逻辑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平台化技术在提升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文价值弱化、伦理风险增加以及社会关系工具化等问题。本文以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关系为理论切入点，系统分析数字化进程中社会价值重构的主要特征，重点讨论技术逻辑对社会结构、公共治理与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认为，数字社会中的价值变化并非简单的价值替代，而是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在技术情境中不断协商与调整的过程。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价值嵌入、制度调适与伦理治理等路径，引导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实现协调发展，从而为数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层面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技术理性；人文关怀；数字化进程；社会价值；伦理治理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echnical rational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orce shaping modes of social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Whi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platform-based technologies enhance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y also give rise to the weakening of humanistic values, increasing ethical risks, and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ak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oncern as a theoretical entry poi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ain features of social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ical logic on social structures, public governance, and individual lifestyles. It argues that value change in the digital society is not a simple replacement of values, but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nd adjustment between efficiency-oriented logic and humanistic values.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value embedding,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and ethical governance as key pathways to promote a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Received: January 19, 2026

Revised: February 3, 2026

Accepted: February 9, 2026

Published: March 19,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concern,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ety.

Keywords Technical rationality; Humanistic concern; Digitalization; Social values; Ethical governance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持续深化，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深刻而复杂的结构性转型之中。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平台化技术体系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浪潮，已经超越了单纯工具或技术手段的范畴，逐渐演变为嵌入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基础设施^[1]。这些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与处理方式，也在制度层面和日常实践层面重塑着社会组织形态、公共治理模式以及个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知^[2]。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技术理性不断强化并扩展其影响范围。技术理性强调效率提升、精确计算、过程可控与结果可预测，通过算法模型、数据分析与自动化系统，将原本高度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转化为可量化、可管理的对象^[3]。这种理性形态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组织管理和公共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然而，随着技术理性逐渐成为数字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其内在的工具性取向也开始对社会价值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技术理性在数字化进程中往往以效率优先和目标导向为核心原则，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加以处理。这种逻辑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忽视社会生活中难以量化却至关重要的人文因素，如情感体验、道德责任、社会信任以及个体尊严。当算法决策和数据驱动机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治理领域时，个体及社会群体容易被还原为数据节点或功能单元，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倾向不断加剧^[4]。

另一方面，技术系统的设计与运行并非价值中立。算法模型、数据选择以及技术应用场景本身往往隐含特定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假设。在缺乏充分反思与规范约束的情况下，技术理性可能在无意中固化既有社会结构，放大社会不平等现象，甚至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分化与利益失衡。这种由技术逻辑主导的社会运行方式，容易使人文价值在决策与治理过程中处于边缘位置，从而引发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衡问题^[5]。

在此背景下，人文关怀作为关注人的主体性、社会公平与公共福祉的重要价值维度，其现实意义愈发凸显。人文关怀强调对个体尊严的尊重、对社会多样性的包容以及对技术发展后果的伦理反思，与技术理性所代表的工具性逻辑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数字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构特征^[6]。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同时，避免人文价值被边缘化，已成为数字社会治理与制度设计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审视。一方面，需要通过理论分析揭示技术理性在数字化进程中对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与价值体系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探讨在数字化治理与技术应用过程中引入人文关怀视角的可能路径。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社会价值重构过程的理解，也为探索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协调共生的路径提供理论基础。

2. 技术理性的内涵及其社会影响

本节围绕技术理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社会影响展开分析。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嵌入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技术理性逐渐从工程与生产领域扩展为塑造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理性形态，对公共治理、组织管理以及个体行为方式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对技术理性的概念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理解数字社会运行方式的内在逻辑。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界定技术理性的基本内涵，强调其以效率、工具性和可计算性为核心特征，并结合数字化语境分析其在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技术理性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强制度执行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审视其扩展过程中对社会公平、个体自主性以及价值多样性可能带来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旨在为后续引入人文关怀视角、讨论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协调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2.1. 技术理性的基本内涵

技术理性通常被理解为以效率、工具性和可计算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理性形态，其关注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最优手段实现既定目标。与强调价值判断和意义理解的人文理性不同，技术理性更倾向于将复杂问题转化为可操作、可控制的技术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最初主要体现在工业生产和工

程技术领域,但随着技术体系的不断演进,其影响范围逐渐扩展至社会治理、组织管理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7]。

在数字化背景下,技术理性进一步强化,其运行逻辑依托于数据采集、算法建模和自动化处理机制,使社会运行过程呈现出高度程序化和标准化的特征。通过对社会行为和运行状态进行量化分析,技术理性试图以计算结果取代经验判断,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这种理性形态为数字社会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8]。

2.2. 数字化语境下技术理性的主要表现

在数字化语境中,技术理性主要表现为算法决策、数据驱动治理以及自动化管理等形式。算法决策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与建模,为公共治理、组织管理和商业运营提供决策支持,使原本依赖人工判断的过程转向以模型输出为依据。数据驱动治理强调以数据作为政策制定和制度调整的重要依据,通过实时监测和反馈机制提升治理效率^[9]。

与此同时,自动化管理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平台化组织到智能系统管理,技术系统逐渐承担起原本由人类执行的协调与控制功能。这些技术实践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减少人为干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使社会运行在表面上呈现出更加理性和有序的状态^[10]。

2.3. 技术理性对社会运行效率的积极影响

从积极层面来看,技术理性在数字社会中的扩展显著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得以更加精准,组织决策过程更加迅速,治理体系的响应能力得到增强。技术理性所强调的标准化和流程化,有助于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提高制度执行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使社会运行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加有序和可控的状态^[11]。

此外,技术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治理的透明化。数字技术使决策过程和运行结果更容易被记录、存储和追踪,为制度监督和责任追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数据和技术系统的辅助下,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所缓解,有助于提升治理体系的可见性和可评估性^[12]。这种基于技术系统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共决策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现代社会中高度复杂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2.4. 技术理性的潜在风险与社会影响

尽管技术理性在提升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其潜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首先，技术理性在强调可计算性和效率优先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忽视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当社会行为被简化为数据指标时，个体的情感体验、道德判断和社会关系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容易在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从而压缩个体的自主空间^[13]。

其次，技术理性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剧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倾向。在算法和技术系统的逻辑框架下，个体容易被视为实现系统目标的变量或资源，而非具有主体性的社会存在。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削弱社会互动中的信任基础^[14]。

此外，技术理性并非价值中立，其背后的数据选择、模型设定和技术框架往往隐含特定的价值取向。在缺乏充分反思与规范约束的情况下，技术系统可能在无意中放大既有社会不平等结构，对社会公平和价值多样性构成挑战^[15]。

2.5. 小结

总体而言，技术理性在数字化进程中既是推动社会高效运行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发社会价值张力的重要因素。其社会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体现为效率提升和治理优化，也表现为对个体自主性、社会关系和价值多样性的潜在冲击。对技术理性的内涵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分层分析，有助于为后续探讨人文关怀在数字社会中的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3. 人文关怀在数字社会中的价值意义

本节从价值与规范层面探讨人文关怀在数字社会中的重要意义。随着技术理性在数字化进程中不断强化，其对社会运行效率和治理能力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但同时也带来了价值层面的张力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人文关怀作为关注人的尊严、主体性与社会福祉的重要价值取向，为理解和回应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关键视角。

具体而言，本节首先界定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阐明其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随后结合数字社会的现实情境，分析人文关怀在技术应用、社会包容以及公共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文关怀在人文价值重构和社会规范调适中的积极作用；最后，从数字治理实践的角度审视人文关怀对协调技术理性与社会价值关系的现实意义。通过上述分析，

旨在为后续讨论数字化进程中社会价值重构及其实现路径提供价值层面的理论支撑^[16]。

3.1. 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

人文关怀强调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照，是社会价值体系中关注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的重要维度。与以效率和工具性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不同，人文关怀更注重人的情感体验、道德责任和社会关系，强调人在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中的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实践之中，也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体现为对社会公平与公共福祉的重视^[17]。

在人文关怀的视角下，社会发展不应仅以效率和增长作为评价标准，而应综合考量技术进步对人的生活质量、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认同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价值取向为理解数字社会中的技术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和规范参照。

3.2. 数字社会中人文关怀的现实体现

在数字社会背景下，人文关怀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人文关怀体现在对技术使用者权益的保护之中，包括对个人隐私、数据安全以及公平使用技术资源的关注。随着数字技术广泛介入社会生活，技术系统对个体行为和社会机会的影响不断加深，人文关怀视角有助于防止技术应用过程中对个体权益的忽视。

另一方面，人文关怀也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包容与支持上。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在技术接入能力、数字素养和资源获取方面存在差异^[18]。通过引入人文关怀理念，可以在制度层面关注这些差异，避免数字技术在无意中加剧社会排斥和不平等现象，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包容性发展。

3.3. 人文关怀对社会价值重构的积极作用

在人文关怀的引导下，数字社会中的价值体系有可能朝着更加均衡和多元的方向发展。人文关怀强调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有助于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引入价值反思机制，使技术应用不再仅以效率和成本作为唯一导向，而是兼顾社会影响和伦理后果。

此外，人文关怀为社会价值重构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在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文关怀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调节机制，促使社会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关注人的发展需求和社会整体福祉。这种价值导向有助于缓解技术理性扩展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失衡问题。

3.4. 人文关怀在数字治理中的实践意义

在人文关怀视角下，数字治理不仅是技术和制度的安排问题，也是价值选择和伦理判断的过程。将人文关怀融入数字治理，有助于在制度设计和技术应用中更充分地考虑社会成员的多样需求，提升治理过程的正当性和社会认同度。

通过在人机交互设计、治理规则制定以及技术应用评估中引入人文关怀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系统对个体自主性和社会关系的冲击。这种治理取向强调技术服务于社会，而非社会被动适应技术，有助于构建更加协调的人与技术关系。

3.5. 小结

总体而言，人文关怀在数字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不仅为理解和回应技术理性扩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社会价值重构和数字治理实践提供了规范指引。通过将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相结合，可以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公共福祉，为数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价值基础。

4. 数字化进程中的社会价值重构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透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社会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模式，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社会价值取向的重新排序。在技术理性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效率、创新与竞争逐渐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隐私保护、社会责任与伦理规范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社会价值重构并非简单的价值替代过程，而是多元价值在数字社会情境中不断协商、调整与整合的动态过程^[19]。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社会价值重构，主要体现在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之间的权重调整、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关系重塑，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在数字治理中的价值诉求重新协商三个层面。本节旨在从整体层面分析数字化进程中社会价值重构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并探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在其中的互动关系。

4.1. 数字化进程与社会价值结构的变化

数字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价值结构的深刻转变。在数字社会中，效率、速度与创新能力逐渐成为衡量组织绩效和社会运行成效的重要标准。技术系统

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优化，使社会运行在形式上更加高效和精细，这种变化在客观上强化了效率导向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社会价值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特征。随着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介入，公众对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以及技术伦理问题的关注不断上升。这表明，在效率与创新成为主导价值的同时，社会对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价值后果也保持着持续反思，从而推动社会价值结构发生调整。

4.2. 技术理性在社会价值重构中的作用

在数字化进程中，技术理性对社会价值重构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技术理性以效率、可计算性和可控性为核心，通过技术系统和制度安排影响社会运行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社会对“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理解。这种理性形态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推动社会价值向工具性和结果导向倾斜。

然而，技术理性在价值重构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使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当技术理性成为主导逻辑时，可能压缩价值讨论的空间，使效率标准在无意中取代伦理和社会责任等价值考量。因此，技术理性既是社会价值重构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发价值张力的重要因素。

4.3. 人文关怀在社会价值重构中的调节功能

在人文关怀视角下，社会价值重构并非单纯围绕效率和技术能力展开，而应充分考虑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整体福祉。人文关怀强调对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以及价值多样性的重视，为技术主导的价值重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调节机制。

通过引入人文关怀理念，社会可以在价值重构过程中对技术理性形成必要的规范和约束，使技术发展不至于脱离社会价值目标。人文关怀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反思工具，使价值讨论能够超越单一效率标准，纳入伦理责任、社会包容性以及公共利益等维度，从而推动社会价值向更加均衡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4.4. 数字社会中多元价值的协商与整合

数字社会的价值重构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一个多元价值持续协商与整合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围绕技术应用和治理方式的价值理解往往存在差异。政府、组织、技术开发者以及普通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社会价值重构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

在这一过程中，制度设计和公共讨论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治理机制和价值讨论平台，社会可以在不同价值诉求之间进行协调，避免单一价值取向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多元价值的协商与整合，有助于在技术进步与社会价值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

4.5. 小结

总体而言，数字化进程中的社会价值重构是一个多维度、多主体参与的动态过程。技术理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其主导地位也可能引发价值失衡的问题。人文关怀作为重要的价值调节因素，为社会价值重构提供了必要的规范指引。通过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协调，数字社会有望在提升运行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价值多样性与公共福祉。

5. 结论

在数字技术持续深化并广泛嵌入社会运行的背景下，技术理性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力量。本文围绕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对数字化进程中社会价值重构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讨论。研究表明，技术理性在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工具性取向在扩展过程中也可能对个体自主性、社会公平和价值多样性带来挑战。

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本文指出，数字社会并非仅由技术逻辑单向塑造，其运行方式和价值结构同样受到社会规范和价值选择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强调人文关怀在数字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意义。人文关怀通过关注人的尊严、社会包容性与公共福祉，为技术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价值指引，有助于缓解技术理性扩展所引发的社会价值张力。

此外，本文从社会价值重构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化进程中的价值变化并非简单的价值替代，而是多元价值在技术情境中不断协商与整合的过程。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社会价值重构，主要体现在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之间

的权重调整、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在数字治理过程中的价值诉求协商三个层面。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并非对立存在，而应通过价值嵌入、制度调适与伦理治理等路径实现协调发展，其中价值嵌入侧重于在人机系统设计、算法模型与数据规则中引入人文价值考量，制度调适强调通过治理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伦理治理则着重于通过伦理审查、行业规范与公共讨论机制，对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价值风险进行前置性反思与引导。只有在效率目标与人文价值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性平衡，数字社会的发展才能在提升运行效能的同时，避免价值失衡并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

总体而言，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关系的理解，并为数字治理和社会价值引导提供了理论启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情境，对不同社会领域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互动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以丰富相关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维度。

参考文献

- [1] Habermas J.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J]. *New German Critique*, 1970, (3): 47-92.
 - [2]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0.
 - [3] Floridi L. *The four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Winner L.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J]. *Daedalus*, 1980, 109(1): 121-136.
 - [6] Zuboff S.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30(1): 75-89.
 - [7] Van Dijck J. Datafication, 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 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4, 12(2): 197-208.
 - [8] Mittelstadt B D, Allo P, Taddeo M, et al. The ethics of algorithms: Mapping the debate[J]. *Big Data & Society*, 2016, 3(2): 1-21.
 - [9] Ragnedda M. *The third digital divide: A Weberian approach to digital inequali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10] Gillespie T.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J]. *Media Technologies*, 2014, (1): 167-194.
 - [11] 刘永谋. 技术理性批判与现代性反思[J]. *哲学研究*, 2016, (5): 52-60.
-

- [12] 吴冠军. 数字治理中的技术理性与价值冲突[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9): 25-33.
 - [13] 陈嘉映. 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J]. 学术月刊, 2018, (6): 5-12.
 - [14] 马会东. 数字社会背景下的伦理治理问题研究[J]. 理论探讨, 2021, (4): 88-94.
 - [15] 王俊秀. 技术理性与社会价值重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 (2): 45-53.
 - [16] 张康之. 公共治理中的技术逻辑与价值理性[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 (3): 12-18.
 - [17] 李培林. 数字化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4): 1-15.
 - [18] 马会东, 李想. 数字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路径[J]. 行政论坛, 2020, (6): 14-20.
 - [19] 郑也夫. 技术进步与社会价值变迁[J]. 社会学评论, 2017, (3): 1-9.
 - [20] 马会东. 技术发展中的人文价值问题研究[J]. 探索与争鸣, 2018, (8): 67-73.
-